

## ●文化随笔

## 心祭

——悼念熊秉明教授

阎纯德

2002年岁末最后的日子，风从远方赶来，为香港洒下满天的清凉小雨。这大约是香港冬天的征兆，给人一种莫名的悲凉。12月19日，即“二十一世纪中华文化论坛”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香港浸会大学隆重举行的第二天，我和汤一介、乐黛云教授一起用早餐时，乐教授告诉我一个噩耗：熊秉明教授几天前去世了。

“这怎么可能？”我心里怀疑，可这是真的。我惊慌、笨拙而呆滞地看着乐教授，像被电火闪击了一下。那一整天，熊秉明教授的音容笑貌一直在我眼前飘浮，一会儿像飘来荡去的白云，一会儿像恍恍惚惚的梦幻。

这位1922年出生于江苏南京的诗人、书法家、雕刻家、哲学家，在我心屏上数码式地闪出许多人生岁月的碎片：中国大数学家熊庆来，——他的父亲；清华大学附属承志小学、燕京大学附属中学、云南大学附属中学，——他最初的知识摇篮；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，——为他锻造飞翔翅膀的熔炉；1947年留学法国——在巴黎大学读哲学，在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学雕刻，参加巴黎秋季沙龙、五月沙龙，举行个人展览；1965年开始文学活动，为《欧洲》撰稿；长期在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执教，担任中文系主任；在中国出版著作《关于罗丹——日记摘抄》、《中国书法理论体系》、《展览会的观念》、《回归的塑造》、《诗三篇》等等。这是他生命的脚印，是撒落在中国和法国的智慧之光。我读过他风格独具的诗，那部深不可测的《静夜思》，似乎蕴含了他对人生宇宙万物的思考。他的诗可以透过哲学的折光而表现独特的理性观念，他诗中那种“观念的挑

战”的勇气深深折服了我。

我同熊先生的相识始自1974年的春天，那时我刚到巴黎第三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中文系执教。上课的第一天，在胡尔曼教授的引荐下认识了他。此后，在法国七年的教学岁月里，我们同事四年多。开始，我觉得他对“北京”教员有所疏远，但是当彼此发现真诚以后，诗和艺术便成为共同的语言。从寒暄、交往，到诗和艺术的交流，再到心的默契，我们都发现彼此是朋友。他有哲学家的睿智、诗人的灵气和艺术家的自然文化天性，虽然他的作品很现代，但他对中国文化的信仰很坚定。他曾说他对政治不感兴趣，但我还是听他谈过两次：一次是问我“文革”的事，他说“文革”是中国人永远的耻辱；一次是说海峡两岸的事，他说他赞成文化统一中国的主张，如果大家都以中国文化为重，统一不是问题。我说他是个“文化至上”主义者，他说除此之外，还是个“艺术至上”主义者，若天下真能“文化至上”，中国有救，世界也有救。

我和熊先生真有缘。1984年我和李杨同赴法国埃克斯马赛第一大学教书，在北京登上飞机后，发现熊先生就坐在我的旁边。他握着我的手说：“阎先生，缘分！缘分！”那次巧遇令他高兴，也是我们聊得最多最兴奋的一次。到巴黎后，我们在戴高乐机场握别，可是半个时辰之后，竟然又在巴黎18区的一个地铁入口不期而遇。这一次，我们握着手，高兴得像跳舞，他笑得前仰后合：“缘分！缘分！巴黎真小！这可是上帝的安排，从天上到地下……”当时在场的除了李杨，还有一位女士，虽然没有向我介绍，但我知道她是陆丙安。

缘分是人在生命过程中的太阳，它温暖人情，美丽人生。在法国，我接触的华人学者，除了熊先生，还有黄家城、李治华、程抱一、梁珮贞、陈燕霞、徐广存等，虽说他们与我的友谊深浅不一，但这些都为传播中国文化，并为法国教育和中法文化交流做出赤诚贡献的人，都是我的年长的朋友。我时常把他们从记忆中请出来，重温在巴黎的天空下那些孤独寂寞而又美丽的岁月。

熊先生走了，是在许多朋友不知道的情况下扬长而去的。此

时,我想把我的悼念化为故乡的和风,越过高山大海,鲜花般撒落在塞纳河,以慰抚他的灵魂,并借法籍华人林鸣岗先生的诗句,寄托我沉痛的哀思:

您走了,走了。

但您却留下了,留下了。

《孺子牛》一般中国式的厚重和淳朴,

《鲁迅》的一双慧眼,

《鹤》的独行独舞和期望高翔,

还有那百万字的《静夜思》的写不尽的文情和哲思……

我感到,不是我失去,而是我们都失去了一个好的朋友,  
一个好的老师,

一个真正的艺术大师。

走的人实际上永远地留下了,而没走的人实际上却是永远地走了。人世间大约只有这样两种人。熊先生是留在大家的悲痛里、怀念里、评论里、惋惜里,以及永远记忆里的那种人……

2003年1月10日 于北京

